

卿 汉 关 芹 雪 曹



世 界 巨 人 百 传

关 汉 卿

(约 1210—1300)

涂元济 江五生 编著

总 序

中国文学家卷主编 马重奇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学。悠久的历史为我们带来无数优秀的文学家、无尽优美的作品、无限广阔的幻想,即穷一生的精力,亦难以窥其全貌。然而若能掌握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认识中国不同朝代的代表文体、闻名于世界的大文学家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对研究中国文学,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因此,我们编撰了这一套《世界巨人传记丛书·中国文学家卷》。这套丛书,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诗人、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的最优秀、最伟大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学遗产,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本套丛书共有十本,均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及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这套丛书,虽然着重介绍中国古代十大文学家,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整个脉络。阅读本套丛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必将会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样式主要是诗歌和散文。虽然它们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诗经》和《楚辞》代表着中国诗歌史上两种不同流派,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

文学的奠基者。《诗经》是周初以来广大人民的集体创作。从《诗经》到《楚辞》，是由集体创作过渡到专人著述的时期。屈原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他打破了《诗经》四言的形式，而采用三四言至七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写作，这可算作文学的革新。《诗经》和《楚辞》同属诗歌，但诗歌体裁不足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纷乱，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以匡时救国，宜于叙事说理的散文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便出现了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巨大，尤其对秦汉文学有着直接的影响。屈原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楚辞作家，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汤化先生的《屈原》阐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一生。屈原作品以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光辉，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鲁迅曾高度评价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词，卓绝一世”。

秦汉文学是在继承先秦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秦始皇焚书坑儒，箝制思想，这时期的文坛一片空白。直至汉初大力提倡文教，文坛才逐渐恢复生机。两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汉代散文。汉代散文，不论是政论文、说理文，还是史传文或书翰文，无不继承先秦的说理散文和叙事散文的优良传统并受其影响，因而名篇迭出，丰富多彩。第二类是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代辞赋。汉赋是在荀赋，主要在屈宋赋基础上，广泛吸收，并综合了《楚辞》、《诗经》、先秦散文的一些文体特点和创作方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学。第三类是汉代诗歌，包括汉乐府民歌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歌。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司马迁是两汉时

期最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叶全君先生的《司马迁》，阐述了西汉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家生涯。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代表着两汉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规模宏大、体例完整的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文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五言诗、骈体文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描写了社会面貌，开创了“建安风骨”的传统。西晋的文学作品内容贫乏，片面追求辞藻和对仗。西晋末至东晋，玄学思想渗入文学领域，出现了盛行一时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晋末宋初，陶渊明在诗坛上异军突起，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宋齐以来，出现了以描写景物风光为主的山水诗。继而，谢朓、沈约等开创了“永明体”，使诗歌走向格律化。梁陈时，“宫体诗”充斥一时。骈文是在汉赋影响下而产生的体裁，形成于魏晋，全盛于南北朝，并成为当时文章之正宗。在诗文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盛行起来，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很多，其中陶渊明是最优秀的代表。历来论诗的人都把陶渊明看作是伟大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叶枫宇、肖成二位先生的《陶渊明》，阐述了东晋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一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赞美田园风光、反映田园生活为主要内容，诗风自然朴素，开创中国古代的田园诗派。陶渊明的作品，不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地位及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隋唐五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诗词、散文和传奇小说。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诗歌。唐初陈子昂倡导革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扫除齐梁以来浮艳华美之风,开盛唐诗风之先。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诗的全盛时期。这时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也出现了以描写山水田园风光著称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和以描写壮丽的边塞景色,表现驰骋沙场、慷慨从戎的英雄壮士而闻名的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唐玄宗天宝至唐代宗大历时期,社会经济因受到安史之乱的破坏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同时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也受到种种阻碍。到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如白居易和元稹,以学习陈子昂和杜甫为号召,提出诗歌要继承《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反对没有寄托的作品,发起“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反映人民被压迫的事实,揭露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其中以白居易的创作成就最大。中唐时期,还形成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刘禹锡、李商隐、杜牧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到了唐末,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人,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实况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多,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则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陈定玉先生的《李白》、吴雄先生的《杜甫》和杨志贤先生的《白居易》,分别阐述了中国唐代三位伟大诗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通过抒写自己一生的非凡理想和遭遇,深刻地揭示了盛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反映了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因其诗歌想象奇特,风格雄健奔放,被誉“诗仙”。他的七古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七绝如《赠汪伦》、《早发白帝城》,都是传诵百世的

名篇。李白的诗歌,无论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对唐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杜甫曾称赞李白的诗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诗歌体裁方面,李白不愧是七言绝诗“有唐第一人”,七言古诗也堪称独步。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纷乱的社会局势,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强烈的政治色彩。通过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变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春望》、《北征》和“三吏”、“三别”等,皆为世人传诵。杜甫对各种诗体的运用都极精工熟练,才华卓著,对后世影响极大。研究杜诗亦成为专门学问。称为“杜诗学”。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他一生勤于写诗,今存诗作三千余首,为唐代诗人之冠。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的黑暗、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民间疾苦。他的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中不少篇章、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白诗不仅被后人推重,即在唐代,已经为人争相传诵,甚至流传到日本、暹罗等国,可见白诗的影响深远。

唐代诗歌成就最大,唐代散文的成就也不小。齐梁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北周至隋屡有人倡议改革。初唐的陈子昂树起了复古的旗帜,并率先用古文进行写作。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也提倡古文。德宗、宪宗之际,正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士大夫大都反对过于雕饰的骈文,认为是亡国之音。他们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而质朴的古文正好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在政治上要求革新的同时,进一步要求文学上的革新,因而掀起了“唐代古文运动”。运动的主旨,是提倡写文章必先有充实的思想内容,主张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流畅

的传统,并且大力从事于古文理论的宣传和古文创作,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参与者有刘禹锡、白居易、李翱等人。谢季祥先生的《韩愈》全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古文学韩愈一生的生活与创作生涯。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他把新型的“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乃至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产生了不少内容精湛、形式优美的文学散文,堪称典范。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写了许多阐述儒家经典理论、倡导古文、反对骈文的文章,提出一整套文学主张,以及他的光辉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民间小说(市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古文运动的开展,也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较强的文体;唐代诗歌的繁荣,也在语言、意境等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至贞元、元和年间,传奇小说的写作出现了十分繁盛的局面。

宋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诗、词、散文和白话小说。宋诗的风格和趋向曾有好几次较大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宋诗“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发展得很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词的产生可远追溯到隋代。到晚唐、五代,文人词的创作达到高潮。到宋代,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出现一批诸如柳永、苏轼、贺铸、周邦彦、秦观、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著名词人。宋代散文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便出现了大量散文作家,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到宋代便演变而成为“说话人”的话本。宋代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这一时期,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是大文学家苏轼。陈节先生的《苏轼》,阐述了北宋大文学家苏

轼的文学艺术发展道路。苏轼在散文、诗、词诸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其文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向来与韩愈、柳宗元三家并称；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在艺术方面独具风格；其词以高旷清雄的风格，开创豪放一派。苏轼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成就，达到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杂剧是元代文学的主流。元代杂剧是宋金以来在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元杂剧五百三十五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三十六种。关汉卿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涂元济、江五生二先生的《关汉卿》，阐述了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生涯。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我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戏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六十多本杂剧，广泛地反映了元代被压迫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揭露和鞭挞了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腐败的社会风尚。关汉卿对创作杂剧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元杂剧的奠基人物和元代剧坛的领袖。《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等均为我国古代戏曲中优秀精品，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大。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宫天挺、郑光祖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

明清两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小说时代。在明代，文言小说处于低潮时期，白话小说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白话短篇小说，成就卓著的是“三言”、“二拍”五个集子。此外，明代的长篇小

说也盛极一时。不但有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和笑笑生《金瓶梅》等名著,还有《风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都各有价值。清代小说,以曹雪芹《红楼梦》、蒲松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儒林外史》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以曹雪芹的成就最高。欧阳健先生的《曹雪芹》,反映了清代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的生活道路。曹雪芹博学多才,为人清高,是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代表作《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一个贵族官僚大家庭的盛衰史的描写,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的批判,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峰,问世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百多年来,研究《红楼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足见《红楼梦》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以上简介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概况及十位伟大文学家的文学成就。《中国文学家卷》(10本)均包含以下内容:一、文学家的时代和生平;二、文学家的创作道路;三、文学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四、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每部传略均能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来阐述每位文学家伟大而不平凡的生活道路和文学艺术生涯。这对于大中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最伟大的文学家的文学成就,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马重奇识

1999年1月7日于福州

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元熊自得《析津志》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为关、白、马、郑为妥也。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目 录

1	关汉卿生活的时代	1
2	关汉卿生平与创作	12
3	关汉卿的戏曲创作	24
	政治社会剧	24
	爱情婚姻剧	46
	历史剧	68
4	关汉卿的散曲创作	79
5	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92
6	关汉卿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10

1 关汉卿生活的时代

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古代的文艺家们怀着激情辛勤创作，为我们描绘了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画卷，建筑起一座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在这一座座的艺术殿堂中，名篇佳作灿若星河。它们无疑是我们“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而且曾经点燃乃至继续点燃着“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当然，这些建筑艺术宫殿的文学大师们的才华和智慧、思想和人格、灵魂和生命也是十分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的。

元代，是蒙古贵族统治的朝代，这是一个产生悲剧的时代。由昏王暴君、贪官污吏，乃至恶霸地痞、流氓无赖而织成的统治网，像具无形枷锁，桎梏着求告无援的平民百姓，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将广大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给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留下了极为黑暗的一页。

面临着一种严酷的生存危机，一批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没有消极，没有沉沦，他们与民间艺人合作，组织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杂剧脚本，他们的杂剧创作，鲜明地站在人民

一边,为惨遭欺凌的善良百姓,喊出了蕴藏胸中对黑暗污浊现实的满腔怨愤,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成为元代下层人民的代言人,成为元代下层人民人生理想和善良愿望的体现者。

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就是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杂剧作家的一面旗帜。

蒙古族原是散居在北方的、受金朝管辖的一些游牧部落。公元1206年铁木真征服了蒙古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蒙古帝国。他当了蒙古汗国的第一位皇帝,称为吉思汗(元太祖)。随后西征灭了西夏。其子窝阔台(元太宗)于1234年联合南宋灭了金朝,之后又开始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攻打南宋的战争。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直到1368年为朱元璋所灭,建立明朝。

蒙古贵族凭靠自己的孔武驍悍,以弓马之利,扫平宇内,建立了大元帝国。建立元朝之前,其经济、文化都比不上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繁荣、灿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蒙古贵族建立政权之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混乱,呈现出反常的、无序的状态。蒙古贵族面对庞大的汉民族,仿佛掉进了汪洋大海,深感文化的卑弱,从而陷入了两难处境:既希图通过汉族地主文人协助以汉法治理天下,又担心异民族本能的反抗心理,害怕他们一旦掌握重权而危及自己的政权。因此,以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身份成为全国的元蒙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

和维护其对人数远远超过本族的汉族的统治,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按照族别和地区,将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人、西夏人,以及从海外来的阿拉伯人;汉人指北中国的汉人,也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等;南人则指元廷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也就是元代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范围内的居民。汉人和南人绝大部分是汉族。等级不同的民族,在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地位、待遇、权利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政治上,据《元史·百官志》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之长均以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不能做官,一般机构,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即省以下各级地方官均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代为办事,色目人监督牵制。元蒙统治者在编制军队方面,也同样实施四等人制,将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不同的军队由不同等级的人充任,职责和待遇也不相同。结果一系列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导致了以几个大军阀为首的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元蒙统治者尤其禁止汉人阅悉兵籍。《元史·兵志》载,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得阅其数,故有元一代掌握全国兵权的枢密院长官除少数色目人外,皆为蒙古大臣,无一汉人充任。掌纠察百官善恶的御史大夫,“非国姓不以授”。

在法律上,明显体现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性质,各民族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不同等级的人在犯罪处理的机

关,判罪处罚的轻重,服刑的待遇等方面都有极不平等的规定。《元史·刑法制》载:汉人、南人犯法由刑部断决;蒙古人、色目人犯法,则由大宗正府审理。另外,“蒙古人居官犯法,……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也如之。”汉人犯盗窃罪的要脸上刺字,而蒙古人犯同等罪,则“不在刺字之例”,如果“诸审囚官强愎自用,辄将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字除之”。犯杀人罪的汉人、南人都要抵命,还要征“烧埋银”,而“蒙古人殴死汉人者”,却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而已。汉人犯罪入狱,“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连饭食也要由家人供给;而“蒙古人除犯死罪,监禁依常法,有司毋得拷掠,仍日给饮食”。另外,元朝统治者还规定,汉人和南人不准学武艺、打猎,不准有兵器,甚至连一把铁尺也不许有。汉人和南人被征召当兵,也只能驻在边塞,而不许驻在内地。所有这些都赤裸裸地暴露了元朝民族压迫的特点。

元代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民族压迫的深渊,吏治腐败情况也非常严重,官爵可以论价出卖,贪赃枉法成风,法纪松弛,社会混乱。地方官吏,政府不发薪俸,任由他们想方设法百般搜刮民脂民膏,为所欲为。贪官污吏为了要钱,巧立名目,部属迎接新官,要交“拜见钱”,逢年过节,征收“追节钱”,管事人索取“常例钱”,迎来送往有“人情钱”,告状办案交“公事钱”,白要称“撒花钱”;官员到富庶地方任职,叫“好地分”,离家乡近的地方任职,是“好窠窟”。仅大德七年,一次就发觉赃污官吏 18473 人,赃款 45865 锭(每锭合五十两

银子),冤狱 5176 件。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黑暗野蛮的统治,自然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汉人、南人的不满;“官吏奸贪,盗贼群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材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弃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国而事外夷,取虚名而获实祸”。这是汉人儒士对时弊的指责。

在建立元朝以前,蒙古社会制度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奴隶制,同中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相比是落后的。蒙古贵族统治之初并不是推进农业的发展,而是侵占大量良田为牧场,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元朝皇帝对贵族、官僚、寺院僧侣的赐田数量大得惊人。如平江府官田先后被武宗、泰定帝、文宗、顺帝赐给诸王公主,其数量多至一千五百顷,少者五十顷。元顺帝两次赐给权相伯颜田达二万顷。大都城西的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田有 32.5 万顷之多。蒙古贵族更是仗势强占民田。汉族官员赵天麟在给元世祖的奏疏中就曾指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他们都变成了“家资累巨万”的大地主,吸吮农民的脂膏,踩着农民的尸骨去攀登“天堂”。对人民的剥削则有残酷的高利贷,官营高利贷机构称“斡脱所”,私营的称为“解典库”,利率极高,息转为本,本再生息,时称“羊羔利”。农民一旦借上,到期偿还不了,往往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除外,还有沉重的徭役,水旱虫疫之灾,弄得民不聊生。明宗天历元年,全国饥民、流民竟达八百多万。刘时中散曲《上高监司》